

培文书系·大学创新课程教材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Practical Course

顾问 杨慧林
主编 高旭东

比较文学 实用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培文书系·大学创新课程教材

比较文学 实用教程

顾问 杨慧林

主编 高旭东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Practical Cours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文学实用教程 / 高旭东主编.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7

(培文书系 · 大学创新课程教材)

ISBN 978-7-301-19108-8

I. ①比… II. ①高… III. ①比较文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9057 号

书 名: 比较文学实用教程

著作责任者: 高旭东 主编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108-8/I · 235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2.5 印张 390 千字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比较文学实用教程》编写者

顾问 杨慧林

主编 高旭东

导 言	比较文学的视角与世界文学的观念	中国人民大学	杨慧林
第一章	比较文学的定义、学派及发展	深圳大学	江玉琴
第二章	影响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陈戎女
第三章	形象学	山东师范大学	姜智琴
第四章	平行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范方俊
第五章	主题学	辽宁师大 东北师大 大连外院 大连大学	王 立
第六章	文类学	中国政法大学	宋庆宝
第七章	比较诗学	中国人民大学	高旭东
第八章	跨学科研究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管恩森
第九章	国际中国学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周 阅
第十章	中国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	汪立珍 那 敏 李彩花
第十一章	世界华人文学与流散文学	北京语言大学	陆 薇
后 记	本教材的缘起、特点与使用说明	中国人民大学	高旭东

目 录

导 言 比较文学的视角与世界文学的观念	杨慧林 1
第一章 比较文学的定义、学派及发展	11
第一节 比较文学的定义、学派及最新发展	12
一、什么是比较文学?	12
二、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总体文学	15
三、比较文学的学派	17
四、比较文学的最新发展	23
第二节 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现状	27
第二章 影响研究	33
第一节 影响研究的理论表述和分类	34
一、梵·第根对影响研究的描述和细分	34
二、影响研究的特点以及对其的反思	40
第二节 “孤儿”在英国的足迹：影响研究案例分析	43
一、研究案例的主要内容	43
二、对研究案例的总括和评价	48
附案例 《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51
第三章 形象学	81
第一节 形象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82
一、形象学的渊源与发展	82
二、形象学的特点与功能	85
三、形象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	88
四、形象学的研究方法与前景	92
第二节 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形象学案例分析	93
附案例 中国异托邦：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化他者	100

第四章 平行研究	109
第一节 平行研究及可比性	110
第二节 中西文学的通感: 平行研究案例分析	118
附案例 通感	127
第五章 主题学	137
第一节 主题学的由来、发展及基本理论方法	138
一、主题学理论的由来	138
二、主题学在汉语文学研究中的发展与开拓 及其反传统性质	139
三、主题与母题的侧重与区别	141
四、主题学研究中的意象、情境、套语、惯用语	145
第二节 案例分析: 印度文学在东亚文学中的触媒作用	151
附案例 印度故事在中国及其他国文学中之作用	155
第六章 文类学	167
第一节 文类学述要	168
一、纵向溯源: 中西文类学概述	169
二、横向剖析: 文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175
三、个案举要: 诗歌、小说、戏剧、散文	178
第二节 中西诗歌的情趣: 文类学的案例分析	180
附案例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	185
第七章 比较诗学	195
第一节 比较诗学的兴起与中西比较诗学	196
一、从崇尚文学的理性到理性的没落	198
二、早熟的置重情感的中国诗学	203
三、中西诗学对话的误区与教训	206
第二节 反潮流: 钱锺书《诗可以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208
附案例 诗可以怨	216
第八章 跨学科研究	229
第一节 跨学科研究的范畴及学理依据	230
第二节 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233

一、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	233
二、文学与人文学科	241
三、文学与自然科学	254
第三节 案例分析:《圣经》与文学研究	258
附案例 《圣经》与美国神话	262
第九章 国际中国学研究	269
第一节 作为比较文学分支的国际中国学研究	270
一、“国际中国学”与“国际中国学研究”	270
二、国际中国学及其研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273
三、国际中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278
四、作为比较文学的分支	283
第二节 国际中国学研究案例分析	285
一、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	285
二、对研究人员的学养要求	288
附案例 日本近代儒学研究三闻人	291
第十章 中国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	305
第一节 中国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概况	306
一、各民族文学的关系研究归属比较文学的理由 及历史沿革	306
二、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发展现状	310
第二节 案例分析:蒙古史诗传统与汉族演义小说的文化融合	315
附案例 蒙古史诗传统与汉族演义小说的结合——《五传》论略	318
第十一章 世界华人文学与流散文学	325
第一节 世界华人文学与离散文学	326
一、概念辨析:从海外华文文学到世界华人文学	326
二、世界华人文学与流散文学的特征	330
第二节 世界华人文学与离散文学案例分析	334
附案例 简论麻将与《喜福会》的主题与结构	339
参考教材	348
后 记 本教材的缘起、特点与使用说明	高旭东 349

导 言

比较文学的视角与世界文学的观念

杨慧林

旭东兄在人大文学院担任长江学者以来，潜心推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并特别针对比较文学的教学需求，组织编写了《比较文学实用教程》。我因承担西方文论的教学工作而隶属于这一学科，不过私下里却始终以为自己更多从事的是宗教学研究，在现行的学科制度中多少有一点不务正业之嫌。好在西方宗教学之父缪勒（Max Müller）有一句名言：“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只知其一，其实是一无所知。）这常常成为我的托辞，因为如果说“宗教学”（religious studies）的根本是对单一立场和信仰身份的挑战，那么对“他者”的关注同样是比较文学的先天品质。正如埃里亚德（Mircea Eliade）所说：不同的宗教现象，实际上具有“最根本的一致性”，而这是“人们直到近代才意识到”的“人文科学精神历史的统一性”。^①

以西方思想为主要概念工具的现代人文学术，在 20 世纪以来始终纠结于主体的有限性和语言的有限性，乃至话语权力、真理系统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就此早有宗教学者断言：在“现代性”的扩张和叙述中，一切“他者”都已经远非“真正的他者”，而只是“我们欲求的投射”或者“投射性的他者”（projected other）^②，亦即被单一主体所描述的对象、被自我所认识的“非我”，甚至只是“异

① 〔美〕埃里亚德：《世界宗教理念史》第一卷，吴静宜等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1 年，第 30，32 页。

② David Tracy, *Dialogue with the Other: the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Louvain: Peeters Press, 1990, p.4, p.49.

己者”或者“异教徒”而已。从这样的角度反观文学研究,那么单一的视角让位于多元、任何一种叙述都不再具有“中心”的地位,可能正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前提。这一点在“方法化”的“比较文学”和追随西方的“世界文学”研究中常常被遮蔽,实际上却正是这一学科对人文学术的最重要启发。回到宗教学或者当代神学的命题,这就是“让上帝成为上帝”、“让他者成为他者”,由此才能开始真正的“对话”,才能了解“我们”之外的声音。^①

以此为基点的研究,最终不可能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比较、文化比较,而必然要指向“话语”本身的重构。这应当是“比较文学”与“宗教学”共同分享的价值命意。1990年代的学科调整以后,“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合而为一,被正式更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并完全归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对中国高校的学科建制而言,这一调整是意味深长的。它使“世界文学”的概念必将在汉语的语境和理解结构中重新定位,也标志着“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被置为中国学人的外国文学研究之根本背景。

然而客观地说,学科调整的潜在意味可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乃至“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往往成为两个互不相干,甚至互相拆解的部分。其中除去可能存在的外在因素,“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自身问题也确实需要予以清理。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传统与主要问题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所含的最年轻学科。它所面对的基本问题,首先是从两个方面延续而来。

第一,西方所谓的“世界文学”,起源于歌德对“人类共同财产”的呼唤;由此他将“世界文学”区别于“民族文学”,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世界文学的时代……早日来临”。^②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出发,提出“精神的生产”必然同“物质的生产”一样,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进而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③按

^① David Tracy, *Dialogue with the Other: the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Louvain: Peeters Press, 1990, p.49.

^②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255页。

照朱光潜先生的说法,两种“世界文学”的含义似乎大致相同,只是分别基于“普遍人性”和“世界市场”的观点而已^①;按照美国学者韦勒克(René Wellek)的理解,歌德的“世界文学”则意味着“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每个民族都在……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而并非“放弃它的个性”^②。

由此立论的“世界文学”,无论是对物质生产之决定性作用的判断,还是诗人式的“普世主义”的理想,恰好都可以成为一种比较研究的观念基础,却与中国高校学科建制中的“世界文学”相去甚远。从“世界文学”所曾经历的学科归属就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指中国学人视野中的外国文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高校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而已,因此才一度被“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所排斥。如果不能在汉语语境和理解结构中为“世界文学”提供恰当的定位,其学术身份就始终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第二,“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之说,一般认为是出自19世纪的英国批评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真正使比较文学研究得以推进的,当属所谓的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建立以后的多元发展。其中的种种纠葛,也成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背景。

法国学派大约肇始于19世纪,而兴盛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时,一批法国学者针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所关注的“异国情调”、诗人式的随意联想,以及过于空泛的“文学异同论”,特别强调以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找出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具体接触、相互影响和实际沟通。如果没有这类实证材料的支撑,“比较”的基础便不能存在。后来法国学者基亚(Marius-François Guyard)直截了当地宣称:“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③

由此立身的“影响研究”往往立论严谨、持之有据,确实对于比较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而且至今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将比较文学定义为“国际文学的关系史”,似乎只能去发掘“某人与某篇文章、某部作品与某个环境、某个国家与某个旅游者”的具体联系,“什么地方‘联系’消失了……那里的比较工作也就不存在了”。而问题在于:文学的共通价值未必在于不同作品之间的“事实联系”(factual relations),也很难说“实证”之外的“比较”就一定是“形而上

①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第113页。

② [美]韦勒克等:《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43页。

③ [法]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学的或无益的工作”。^①于是,有美国学者向法国学派发起了尖锐的挑战。

1958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次全会在美国举行,时任耶鲁大学教授的韦勒克以《比较文学的危机》为题,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他认为:法国学派的研究方法“受制于陈腐的19世纪的唯事实主义(factualism)、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和唯历史主义(historical relativism)”,这几乎将比较文学研究变成了两国文学之间的“外贸”(foreign trade),却无法凸显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文学性”(literariness)。^②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Henry H. Remak)的《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1962)一文,进一步超越直接的“影响”,界说了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甚至跨学科的“平行研究”观念。

作为“新批评派”(New Criticism)的后期代表,韦勒克所强调的“文学性”是要在历史、哲学、传记、心理学等等“外部研究”之外,“抛弃哲学的假定、抛弃心理学或者美学的解释”,为文学批评建立独立的规则。这实际上是与20世纪的种种“形式批评”一脉相承,比如俄国形式主义所强调的“自主性”(autonomy)、“具体性”(concreteness),英美新批评所提出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s),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所总结的“叙事结构”(structure of narrative)、“叙事语法”(grammar of narrative),符号学批评的“阅读代码”(codes of reading)等等。所有的“形式批评”都是力图找到一种在文本之前“预先存在的系统”,或者可以从不同文本归纳而来的共同结构,以便借助这种系统或者结构去解读个别的文本,其间未必没有“实证”的精神^③;反过来说,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也未尝不是“形式批评”的直接变种^④。韦勒克等美国学者对法国学派的最主要批判,显然不在于是否需要“实证”材料,而是针对“实证”方法所导致的“技术化”倾向,并借此呼唤在“事实联系”的文本考证中渐趋暗淡的人文学内涵。

① 以上引文请参阅〔法〕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第2页。

② René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282—284, 289—292, 见王柏华“西方比较文学发展史渊源”,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16页。

③ 比如埃亨巴乌姆曾提出:“形式主义者……具有一种科学实证的精神,即抛弃哲学的假定、抛弃心理学或者美学的解释。”就此,他才引用雅克布森的话: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Paul Goring, *Studying Literature: The Essential Companion*, London: Arnold, 2001, p.145.

④ 比如热奈特(G. Genette)就将“法国的‘主题学批评’(thematic criticism)”同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归为一类。Paul Goring, *Studying Literature: The Essential Companion*, p.165.

1954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以后,各国比较文学学会也相继诞生,比如法国(1954)、日本(1954)、美国(1960)、德国(1968)、加拿大(1969)、菲律宾(1969)、匈牙利(1971);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则成立于1985年。自此不断有学者提及的所谓“中国学派”,也被逐渐归纳出一些基本特征,比如跨文化的东方立场、“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原则、借助外来理论阐发中国文学的批评实践等等。^①

从“比较文学”的上述发展看,无论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的形成,都有相当明确的针对性,同时又始终没有离开其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的总体线索。因此,尽管西方大学建制中的“比较文学系”远远早于中国,却未必是什么“学科意识”的产物,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超越学科的研究平台,其基础则是在于更为开放的文学视野。正如美国学者勃洛克(Haskell M. Block)为“比较文学”作出的定义:“在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时候,与其强调它的学科内容或者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如强调比较文学家的精神倾向。比较文学主要是一种前景、一种观点、一种坚定的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设想。”^②

相对而言,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当其初始之时,也曾因其观念之新、方法之新而振聋发聩,并对1980年代的人文学术之复兴起到过重要作用。^③但是,也许因为我们过于热衷“学科”和“学派”的建立,从而对“方法”本身及其“学科”独立性的关注日甚,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比较文学”的根本命意及其应当为文学研究带来的整体启发。这样,一方面是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趋于萎缩,另一方面勃洛克式的开放态度又引起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何以成为独立学科”的担忧。

其实,“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也许注定是关联性的,对中国学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不仅标志着一种“倾向”、“前景”、“观点”或者“设想”,而且也表达着当代人文学术的内在精神;不仅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立身之本,也是文学研究之人文学价值的关键所在。

① 请参阅代迅“中国学派与阐发研究”,见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196—206页。

② 于永昌等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

③ 这里主要是指中国内地的比较文学研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引起的震荡。例如乐黛云的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见《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三期;曾小逸主编的文集《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和内在精神

理解已经是诠释。在汉语的语境和理解结构中为“世界文学”定位,已经意味着一切外国文学研究都必然以“比较”的观念为前提。在汉语语境中,任何纯然的“×语语言文学研究”实际上都不可能存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谓,在这一意义上特别强烈地凸显出一种内在精神,其价值远远超越了那些学科之争。择其要者,至少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1. 从“对话”到“间性”的意识

“对话”是“他者”的自然延续。“让他者成为他者”既是一般对话理论的基础,也正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起点。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所展开的“对话”,显然不是要在不同文学之间清谈什么“可比性”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借鉴“他者”的经验、或者论说所谓的文化多元。归根结底,“比较”中的“对话”最终是要返诸己身,透过一系列对话关系重新理解被这一关系所编织的自我。其中最基本的意义,是“在他种文化的眼中……更充分地揭示自己”,从而“相互丰富”^①。这应当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整体研究的独特价值。进而言之,“比较”与“对话”的更深层意义,还在于当代人文学术从不同角度所关注的“自我的他者化”(self-othering)^②、“对宾格之我的发现”(Me-consciousness)^③,亦即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意识。

意识到“我”具有主格和宾格、指称者和被指称者的双重身份,意识到“主体”只是存在于一种对话关系之中,“对话”便成为起点而不是落点,“对话”也才能超越近乎托辞的“多元”,进深到“间性”的自省。其中所荐含的自我批判,乃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断激活甚至重组人文学术的根本原因。因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成果,往往并不是停留在文学文本的比较和分析,而是对“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和现代性神话的全面颠覆。

2. “问题”对“学科”的消解

如果我们承认知识的内在精神也会成就一定的表达形式,那么曾经作为知识

① [俄]巴赫金:《言辞美学》,刘宁译,载《世界文学》1999(5),第221页。

② David P. Haney, *The Challenge of Coleridge: Ethics and Interpretation in Romanticism and Modern Philosophy*,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81—184.

③ [西班牙]潘尼卡:《宗教内对话》,王志成等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表达形式的“学科”概念必然要受到“他者”、“宾格之我”和“间性”意识的深层影响。这些意识在学科制度中的渗透，注定要带来学科界限的消解和跨学科研究的形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本身，就格外突出地显示出一种“学科的间性”(inter-disciplinary)，亦即“跨学科性”。

“学科”之由来，其实只是为了回应某种特定的社会状况和精神活动。当曾经建构过某一学科的社会状况不复存在或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该学科的知识必然要被重组。在当代人文学术的研究领域中，学科界限的消解和学科专业的“问题化”趋向，或许正是当代社会对人文学术的最根本建构。这早已不只是一种理论的推演，而是确凿的学术现实。

作为一个最年轻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格外鲜明地反映着当代学术的“非学科化”倾向。因而大量的“普遍性论题”和“公共话语”，常常都是首先进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视野，同时又不能为任何一个学科所独有，也没有哪一学科能提供回答这些问题的全部概念和逻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所以可能成为学科重构的典型，正在于传统的学科分野已经无法限定它的论题范围和研究领域。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提出：曾经以学科方式回答过的种种问题，在20世纪以来又都成了新的问题，并且是以非学科或跨学科的方式重新被提出。现代性进程一方面加速完成了“学科化”的知识建构，另一方面又激发了对“学科化”的反思性怀疑和批判。^①就此而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与这一过程同步而且同构的。

3. “弱势”和“边缘”的文化策略

沿着“他者”、“宾格之我”、“间性”及其对传统学科界限的消解，也许可以大致描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和内在精神。其中的逻辑线索集中体现了当代人文学术的基本处境，其中所蕴涵的先锋性和批判性也会再度回馈这一处境。因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对文学比较和文本分析的超越，一方面使它代表着一种知识方式的重构，另一方面也由此而成为弱势群体或边缘文化“改变世界”并“阅读自己的文本”^②之直接手段。

从这样的角度考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我们会发现它所导致的阅读活

^① 请参阅《问题·发刊词》，见余虹等主编《问题》第一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②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see David Lodge with Nigel Wood edited,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logy*,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Inc., 1988, p.491.

动注定要延伸为一种“弱势”的立场。比如对文学文本的“历时性”考察,几乎必然会质疑“共时”的文化结构;“阅读自己的文本”,几乎必然会动摇“叙事”所编织的意义和秩序。从而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女性主义写作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既通过叙事主体和语境的变换为“比较”提供了理论支点,又恰好是借助“弱势的性别群体”和“弱势的边缘文化”向强势文化及其“话语霸权”发出的挑战。

由此而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也可以被表达为弱者的文化策略。这与“他者”的呈现、“间性”的意识及其对于“学科”的消解一样,最终的根基和意义未必只限于文学文本和文学阅读自身,而应当拥有更广阔的天地。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趋向及可能空间

中国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在1980年代以后曾有过相当迅速的发展,曾经聚集过文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科中一批最活跃的学者。然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张力、“学科意识”及其内在精神的冲突、理论旨趣和批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特别是较多存在于这一领域的“教材体”或程式化的写作方式,都日益明显地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使“大旗号”下的具体研究难以深入。就此,研究者相继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看法。其中所蕴涵的,正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未来趋向及可能空间。

1. “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文学视野

“比较文学”被界定为“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①,已经是学界的共识;而中国学人所能展开的“世界文学”研究,实际上也必然会有“比较文学”的基本性质。但是这一性质的真正体现,显然不在于它能否保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独立地位,而在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潜在命意和人文学价值。换言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人文学视野,是其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这必然与技术化、程式化的研究相互抵触,也决定了它不可能被狭隘的“学科”归属所束囿。

在近些年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逐渐被问讯的实际上正是一些更具人文学意味的问题。比如从“文学间的对话”到关于“存在”的对话性意识,

^① 乐黛云:《跨文化之桥·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从母题、形象或者类型的异同到关于文化想象与文化身份的结构性分析，从文学与文化范式的梳理到关于“经典化”（canonization）过程的揭示。也许可以说，这些都将成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自然延伸。

2. 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史”视野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向，还将导致一种对于“外国文学史”的全新叙述。这一方面意味着“教材体”写作必然被抛弃，另一方面也使文学史的研究必须被置于批评史的背景。西方学界借助不同批评方法处理同一文学作品的尝试，便是可循之例。比如在美国出版的“当代批评中的个案研究”丛书中，《哈姆雷特》之类的文学经典都是根据心理分析学派、英美新批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典型的批评模式，得到多层面的读解和描述^①，从而文学理论在文学作品的分析中展开，文学史又被批评史的线索激活。

长期以来的“学科规范”和“教材体”叙述方式，不仅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难以深入，实际上也早已引起学生的反感。不久以前有学生在互联网上发表《〈机器猫〉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一文，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文科的刻薄和想象，运用那些充斥于外国文学教科书的典型术语和分析模式去“解读”日本人写给小孩子看的连环画《机器猫》，从而使这种“解读”显得非常可笑。而问题在于，我们之所以觉得它可笑，只是因为被解读的文本并非“巨著”、也毫无崇高感可言，其实同样的解读方法大量存在于相关的“教材”、“研究”和“学术训练”之中。有鉴于此，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对“外国文学”进行重述，有理由成为我们的期待。

3.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

在目前的文艺理论界，“文化研究”确实引起了诸多争论。而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未来空间而言，它不仅注定是题中之意，而且可能会带来“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学科意识”远不及国人强烈的西方学界，这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争议。

20世纪后期以来，影响颇大的 Polity 出版公司“文学研究”网页上，“文学研究”（Literary Studies）已经同“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合并为一类，并

^① Susanne L. Wofford edited, *Cas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riticism: 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4.

开列出“文学研究与文化理论前沿书目”(the cutting-edge list of literary studies and cultural theory)。这种所谓“文化转向”的基本意图,是要突破狭窄的审美中心和文本中心,将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非审美的思想文化领域和非文本的一切文化对象。因此,西方的传统文学研究越来越多地通过历史文献的钩沉和文学文本的重读,与解析历史文化之成因、结构和趋向的“文化研究”相关联,其中一些问题日益成为整个人文学领域备受关注的焦点。比如文学想象对文化身份的参与(*Sex, Literature and Censorship*, by Jonathan Dollimore),语言结构对价值秩序的渗透(*Language & Symbolic Power*, by Pierre Bourdieu),文本重读对历史叙述的质疑(*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文学诠释对政治哲学的介入(*Hermeneutics as Politics*, by Stanley Rosen),文学研究针对“全球化”潮流进行的反思(*An Anti-Capital Manifesto*, by Alex Callinicos),文学研究对“强势文化”的批判(*Culture and Imperialism*, by Edward Said)等等。

如何评价上述趋向的最终结果,当然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或许应该承认:这一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正在超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自身,悄悄地影响着“中国语言文学”的整体学术品格。